

低度工业化与城市传统手工业变迁： 以近代济南为例

孟玲洲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在近代济南“低度工业化”局面下,城市传统手工业依靠“低度工业化”提供的发展空间和条件,依据工业化的结构来调整行业结构和生产结构,与现代工业形成产业互补关系,寻找生存空间,并且注意吸收工业化所提供的优势资源,来改变自身的相对落后性,经历了技术上的现代性转变,逐渐向机器工业过渡。在工业化的多重刺激下,城市传统手工业实现了对传统的突破,适应与创新是其生存之道。这体现了近代城市手工业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不能用保守与落后概而论之。城市传统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反过来对近代工业化的推进产生了积极作用。现代化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手工业所提供的资源。在一定的地理与市场空间下,传统手工业与现代工业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与互补关系。

〔关键词〕 低度工业化;城市;传统手工业;棉织业;磨坊业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4)03-0044-05 〔收稿日期〕2013-10-15

〔作者简介〕孟玲洲,男,山东临朐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手工业史。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1BLSJ05)

中国传统手工业在近代的遭遇与转型是经济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对此已有不少学者作了整体探讨。但从讨论的区域来看,多以乡村为主,对城市的传统手工业鲜有论述。文章以近代济南的棉织业和磨坊业为中心,对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城市传统手工业的转型进行详细考察,探讨工业化背景下城市手工业的生存之道以及工业化与城市传统手工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求对传统手工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有新的认识。

一、低度工业化与城市传统手工业结构调整

一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开始于洋务运动。作为一个内陆型城市,济南的工业化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速度却很快。时人称“其勃兴之程度,实出常人意料之外”。^{〔1〕}(P145) 济南现代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纺纱、面粉、电力等行业方面。济南机器纺纱业源于1919年成立的鲁丰纱厂,以纺16支纱为主,兼纺20支及12支纱,产品在济南以及津浦路沿线销售。^{〔2〕}(P10-11) 1930年代济南又建立了仁丰和成通两个大型纺纱厂。面粉业是济南工业现代化中一个重要的行业,现代化的程度也比较高。1915年济南创办了山东第一家机器面粉厂——丰年面粉厂。1928年时济南的面粉厂有十二家,数量位居全国第四位,其中10家面粉厂的资本共计五百二十万元,日生产能力达35450袋。^{〔3〕}(P20) 电力工业的发展是工业化的重要标志。济南电力工业开始于1905年创办的济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所发电力主要供城市照明,但企业用电日益占据重要地位。1934年电灯用户数为20766户,每度电价格为两角,电力用户数210户,每度电价格仅两分到六分不等。该年总共售电3528826度,其中企业所用的电量为441307度,约占总数的12.5%。^{〔4〕}(济南市电气公司二十三年度营业概况统计表) 据此可知,企业电力用电的价格远远低于电灯用电价格,企业用电在电力消费中已占有一定地位。20世纪以来济南工业化进程逐步推进,但是工业化的程度还比较低。据统计,1935年济南市仅有60家使用动力的手工工场和现代工厂,因此可称济南的工业化为“低度工业化”。

“低度工业化”给城市传统手工业的发展留下了增长空间,同时又从原料、原动力、市场等方面创造了城市传统手工业近代转型的条件。纺纱业的发展解决了济南织布业的原料制约。济南面粉业的发展不仅为食品业、酱园业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原料,还催生了对面袋生产的新需求,一批生产面袋布的手工作坊和工场相继兴起。电力工业的发展则为济南工业提供了较蒸汽和柴油廉价的原动力。1935年济南60家使用动力的企业中,34家企业以电力作原动力,占总数的一大半。^[5]电力在不同的手工行业中也采用。在城市“低度工业化”之下,城市手工业根据市场变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市场格局,调整自身的生产结构,积极寻求谋生之道。

作为中国的传统产业,棉织业在近代经历了结构性的转型。开埠通商以来,洋纱击垮了中国的土纱业,但织布业却依靠洋纱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民国初年济南织布工场兴起,1919年济南主要织布工场有11家。^{[6](P77-82)}一战时期,济南兴起的本土机器纺纱业所提供的廉价棉纱有力推动了织布业的发展,1924年济南约有30余家织布厂坊,生产的布匹种类有提花布、爱国布、斜纹布等。^{[7](P1)}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济南织布业进入了一个比较快的发展时期,1934年织布工厂发展到110家,织布机计1154台,各工厂工徒共2863人,年产布约37万余匹,值160万余元。^{[8](P29,40,51)}1937年济南市织布业户数约在300户左右。^{[9](P19)}济南织布工业的发展不仅满足当地市场需求,还积极开拓区域外市场,所产布匹大部分行销济南市、山东各县及徐州、开封、蚌埠一带,^{[8](P63)}并且输出比重较大,1932年济南41家织布场共生产棉带三十万打、布匹二十万匹,输出棉带和布匹分别为二十万打和十万匹。^{[10](P4)}

在经营结构方面,棉织业适应形势作出了极大调整,体现了工业化时代人们的消费需求变化和工业化发展本身产生的市场需求对手工业的影响。济南棉织业不再局限于织布业这一单一行业,还产生了织毛巾、针织、织棉线带、织线毯等行业,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其中,织布业作为最为悠久的棉织业,在内部生产结构的调整方面,尤为突出。清末,旗袍料的生产占主流,民国初年爱国布、提花被面、洋布、新式纱布等开始流行起来。华丝葛的盛行则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到了30年代,则出产帆布、条布、面袋布、线呢、线哔叽、自由布等,条布产量最多。^[11]需要指出的是,面袋布制造与济南面粉业的发展有极大关系。山东慈善同人社在筹建山东厚德贫民工厂时,就瞄准了济南的面袋布市场,认为“查济垣有面粉工厂十又二家,如机器开足,每日出粉约四万袋,所用袋布向用外货,漏卮颇巨,约计千台布机之操作方可供四万袋之消费”。^[12]该厂专门生产面袋布和各种粗布,每年的产额约为一万五千匹,“自己缝成面袋供本地各面粉厂之用”。^{[2](P15)}据1934年的统计,济南专门生产面袋布的织布厂坊有41家,占总数110家的37%。另外还有数家兼营面袋布织造。与其他布匹大部分行销济南区域外市场所不同,济南生产的面袋布“全数供给本市各面粉工厂使用”。^{[8](P52-63)}不仅如此,从事面袋布生产的手工工场逐渐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它们多集中在济南城北北坛和刘家庄一带,在相对集中的区域内以便于分享市场信息。面袋布制造业的兴起与济南面粉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可以说工业化深刻影响了手工织布业的结构调整。

磨坊业也是一项传统的手工业,传统时代面粉即由手工磨坊磨制而来。工业化时期磨坊业由于适应特定层次的市场需求而依然存在,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继续发展。抗战前济南约有140家手工磨坊,日伪时期由于机器面粉业的衰落,磨坊业继续有所发展,1942年济南磨坊业达到411家。^{[13](P20)}1950年代初,济南手工磨坊业达到670家,其中畜力磨坊410户,电力磨坊260户。^{[9](P58)}“在厂粉未出现之前,旧式磨坊为供给面粉之唯一机关”,机器面粉厂兴起后,“市场尽为所夺”,^{[14](辛 P425)}这在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城市磨坊业同样是在经历结构调整基础上的发展与演变。面粉市场为机器面粉厂占领后,磨坊业转变营业结构,以磨制杂谷粮为营业,如小米面、玉米面、黄豆面、绿豆面、高粱面、黄米面等。^{[13](P34-35)}抗战之前,济南粮食消费市场,面粉约占72.3%—80.7%,杂粮约占19.3%—27.7%。面粉基本由机器面粉厂供应,而磨坊业在小麦粉供应方面微不足道。^{[13](P66)}可见,工业化时期,虽然机器面粉业代替了磨坊面粉业,但磨坊业并未销声匿迹,反而通过调整自身的营业结构,适应了特定市场需求,得以继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之后,机器面粉业与磨坊业并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一种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互补关系。

二、工业化与手工业现代性演变

除了生产结构的变动之外,手工业的近代转型还表现在生产技术方面。对于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史学界均予以了肯定。应该说,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种现代性演变主要体现在城市手工业方面,而这源于工业化所提供的资源支持。

铁轮机是当时织布业中比较先进的织布机具,济南的织布工场也采用了此种机具。20世纪初期济南“城关及泺口购用新机,改良织物者,约三十余家”。^{[7](P1)}长丰染织工厂1914年时有木铁机约二十张,每日共出布90余丈。^{[15](P56)}30年代初期,济南的大型织布工场一般都采用铁轮机。据调查,1934年济南70多家织布工场共有铁轮机约900余台。^{[14](丁P30)}与传统木机相比,铁轮机的使用提高了织布的效率和布匹的质量,有力促进了济南织布手工业的拓展。

近代济南城市手工业技术的现代性趋向还表现在生产过程中对非生物动力的使用,有学者称之为“石磨+蒸汽机”技术模式,体现了手工业生产中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的结合。^{[16](P200)}如济南岱北染织工场有22台以蒸汽机带动的铁轮织布机,^{[6](P80)}是为山东首先采用蒸汽力的织布业工场。20世纪初期济南有四家机器磨坊以蒸汽机驱动石磨,提高了生产效率。^{[17](P423)}1930年代电力织布机传入济南,1932年中兴诚织带厂一次购买了20台电力机,开良好之风气,1934年又购买了8台电力针织机。^{[18](P225)}鉴于电力织机动力廉价,岱北染织工厂也逐步淘汰蒸汽织布机,开始改用电力织布机。^{[17](P395)}据1935年调查所得,济南共有70台电力织布机,散布于有6家织布厂坊。^{[8](P26-40)}电力在磨坊业中的使用更为普遍,1936年济南的140家磨坊业中有40家以电力为动力转动石磨。电力磨坊在1942年达到206家,较之1936年增长了4倍多,畜力磨坊业增加有限,为205家,增长仅1倍。^{[13](P20)}

近代济南城市手工业技术的现代性趋向还在于手工工场向现代工厂的演变,这在漂染业表现得尤为明显。抗战前,济南的现代漂染厂有5家,除利民染厂外,其余的东元盛、隆记、德和永、中兴诚等现代染厂均是从手工染坊逐步发展起来的。

东元盛染厂的前身是东元盛染坊,创办人是张启垣,1898年在周村创办,当时只有500吊制钱的资本额,替他人染丝线。1916年该染坊迁往济南,当时的设备只有风箱和铁锅各两个。1918年染坊开始自买白布、自染自销,1924年又开始在农村地区雇佣农民织布,获得较大利润。至1926年染坊盈余已有七万多元,具备了购买机器设备的能力。1929年买进轧光机1部,1930年又买进染槽、烘干机、拉宽机、镗床等机器设备若干,发展为手工染布与使用机器染布的混合型企业。1933年东元盛染厂建立了新厂,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染厂。^{[19](P245-254)}东元盛由染坊发展为机器染厂,基本上靠的是自身的资本积累,这一过程长达35年,这可被称之为一种渐进型的演变模式。此外,隆记绸绉染厂也有类似的演进过程,该厂开办之初资本薄弱,只有五百元,其后通过不断的积累,添设机器设备,“遂为鲁省机器染绸之冠”。^{[14](辛P558)}传统手工业通过技术的积累与嫁接,以资本集聚的路径向现代工业过渡,是渐进型演变模式的实质。渐进型演变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根据市场形势不断调整经营策略。例如东元盛在其成长过程中,以市场的变化为基础,先后实行了代客染布、自己买布自染自销、自己织布自染自销等经营形式。^{[19](P245-258)}

中兴诚染厂与德和永染厂也是通过手工染坊发展起来的,但不同的是,他们的发展主要依靠商人资本,而非自身积累,体现了另一种演变模式。中兴诚由规模很小的恒兴手工织带厂演变而来。该织带厂原由两个布庄成立,但因经营出现问题,1929年被济南昌兴运输公司的经理李墨卿收购,建立中兴诚织带厂,当时只有手工织带机十三架。后来东莱银行曹丹庭对该厂投资,李墨卿借此增设了电力织布机20台。1934年东莱银行曹丹庭、周村元兴银号鲍子兴、鲍子更、潍县平市官钱局辛葭舟、徐惠臣等对企业进行了投资。是年底中兴诚购买了一整套染整机器设备。德和永染厂由德和永染坊发展而来,该染坊创办于1930年,系耿筱琴和张新斋合资1.2万元建立。耿筱琴的身份是银号股东,张新斋则是一家棉布庄的经理。染坊请曾在东元盛染厂工作的耿文都、李静轩、张逊之任经理和副经理,还从东元盛聘请了若干技术人员。他们熟悉手工染色业务,因此企业发展良好。1933年时,耿筱琴与7家商号联合共集资71500元,扩充了企业资本,购买了

大量机器设备,1935年正式生产。^{[18](P216-217,224-228)}德和永、中兴诚都是商人兴建的,并且以商人资本为支持,仅以四五年的时间便发展为现代漂染企业,这可称之为急变型演变模式。该模式的实质是手工业通过资本集中、本土技术的继承与对外来技术的嫁接的路径向现代工业的过渡,成功的关键是商人资本的积极参与。

不管是渐进型的资本集聚路径,还是急变型的资本集中路径,两种模式无疑都利用了工业化所提供的先进技术资源支持,并借鉴了工业化时期的工厂管理制度,以寻求与传统的手工作坊管理制度之间的契合点。

三、互补与互动:城市手工业与工业化的关系

城市手工业与现代机器工业之间有竞争的一面,但两者间的互惠关系居于主流。城市传统手工业的近代变迁对城市工业化的推动具有积极意义。

在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变迁中,棉织业是较有代表性的。而棉织业是一个具有较强联动效应的行业,它的发展往往能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正如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于棉纺织业,进而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变革。棉织业是近代山东重要的手工行业,在广大城乡均分布广泛,如潍县是近代中国非常有名的织布工业区之一。棉织业的发展首先导致了对原料棉纱的需求,催生了机器纺纱业。这是前向联进效应。一战时期济南现代化纺纱业的兴起正是因应了该时期包括济南在内的山东棉织业发展对棉纱的需求。而现代化纺纱厂的建立反过来又为棉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保障。因此,现代纺纱业与手工棉织业之间有相得益彰的关系。

棉织业的前向联进效应还表现在棉织业对济南机械制造业的影响方面。由于棉织业对手工生产工具的需求,机械制造业的产业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应。织布业作为济南最重要的棉织业,它的发展催生了济南的织机制造业。织机制造也是济南机械制造中重要的一部分。据1931年对济南14家铁工厂的调查,生产织布机的有4家,生产袜机的有3家,占半壁江山。义发成是一家专门制造织布机的铁工厂,该厂织布机售价40元,每年的产量为400台。郭天成布机厂专门制造弹花机、织布机,每年制造的织布机约有400台。该厂所产脚踏机“每日能织布一匹有余,甚能畅销,普通布厂多用之”。郭天利和天兴机器厂的生产品种相对多一些,涉及弹花机、织布机、面条机等各类机器,郭天利每年木机产量亦为400台左右。天兴机器厂每年木机产量为300台,大木机每台价格为30元。此外,该厂还兼售织布机零件。^{[2](P67-83)}天兴和郭天利两厂“以出品优良,适合当地使用,营业之发达,可追随潍县之后”。^{[14](辛, P638)}济南铁工厂所造织布机基本出售给当地的织布厂坊,其兴起和发展完全是因应当地的市场需求。同样,济南袜机制造业的兴起亦是因应织袜业的袜机需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济南共有3家袜机制造工厂,每年制造袜机190台,每台价格为40元,比舶来品便宜1/3,专销济南当地市场。^{[2](P80-82)}据此可知,棉织业的发展促使铁工厂的生产结构发生变化,走出了传统的机械修理、铸铁等营业范围,制造织布机、袜机等满足棉织业发展需求。机械制造业与棉织业之间相互影响,棉织业推动了机械制造业的兴起与发展,机械制造业则为棉织业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产业发展中的联动关系。

棉织业的发展还产生后向联进效应。如织布业推动了济南的漂染业以及轧布业发展。随着民初以来济南织布业的发展,漂染业渐次兴盛。据调查,1935年济南染色工场和店铺发展到102家,其中6家建立于光绪年间,其余均成立于民国年间,特别是机器漂染业的兴起与发展。^{[8](P1)}染色之后,还需要对布匹进行平整。该工作一般由踹坊负责,但踹坊轧的布匹中间会留下一条“折痕”,机器平整的布则没有,故而机器轧布受到极大欢迎。20世纪30年代济南的机器轧布厂发展到3家。每家有喷浆机和轧光机各1台,以电力驱动,每机每日轧布量为400匹。^{[14](丁, P27)}因染布业的发展,廉价的颜料成为新的需求,颜料制造业也产生了。1920年济南裕兴染料厂运用土法生产煮青,是为济南化学染料业的开端。^{[2](P47)}1930年代天丰、振华又相继建成。由此可知棉织业发展对产业链下游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通过上述事实来看,以棉织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从原料、生产工具到产品加工、产品消费市场的产业链。手工业因应现代工业的发展,通过行业结构和内部生产结构的调整,在这个产业链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位置,增强了与现代工业之间的互动与互补。

除了行业结构调整削弱了手工业与现代工作之间的竞争性,增强了互补性外,市场的因素也值得考虑。

20 世纪初以来, 济南的人口量增长迅速。1909 年济南人口为 246000 人, 1936 年人口增长为 442258 人, 是 1909 年的 1.8 倍。^{[14] [丁 J⁸] [20]}由此可以推断, 市场容量增长为原来的 1.8 倍, 日益增长的市场容量为手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发展空间, 特别是棉织业、磨坊业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不过当市场容量缩小, 或者经济环境恶化时, 两者间的竞争就比较明显。1930 年代经济危机下, 洋货大量倾销, 济南漂染业市场饱和, 机器染厂呈文山东省政府建设厅, 认为小规模漂染工厂妨碍了机器漂染工厂的发展, 主张对设立小规模漂染工厂予以限制。^[21]

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历来争论不已。就手工业与现代工业来说, 两者有竞争的一面, 也有互补互动的一面, 在看到两者存在竞争的同时, 也应看到二者之间的互补性, 这才是主流。济南工业发展的事实表明, 一方面, 手工业和现代工业能够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行业结构上的整合与调整, 形成两者之间在行业结构上的差异与互补, 进而形成两者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产业链条, 增强了两者在行业间的联动效应, 避免了行业之间的竞争; 另一方面, 即使在同一行业内部, 手工业与现代工业两者之间也并非总是竞争性的, 而是有着广泛的联系与互补, 如生产工序上的互补、市场层次的互补等等。以市场互补为例, 现代工业消费品一般质量较好, 价格也较手工品高, 非一般平民所能消费, 因此手工业品的消费对象多为社会底层民众。如磨坊主要磨制杂粮粉, 其产品与机器面粉厂之间存在差异性, 形成互补关系。磨坊生产的面粉基本上只供自己消费, 不在市场销售。第三, 日益增长的市场容量和空间可以容许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的共同发展。可以说, 济南的手工业利用了城市“低度工业化”的许多资源, 而现代工业的发展尚处于低水平阶段, 很少对手工业发展造成压力。济南手工业发展的最大压力来源于区域外产品, 特别是外国产品的竞争。

四、结语

工业化是近代社会最大的变革之一。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 工业化对人类社会的传统产生了激烈冲击。在此之下, 传统的命运也一直是人们探讨的焦点。对于传统手工业来说, 工业化的作用是多重的。近代中国“低度工业化”的发展, 既导致了一些传统手工业遭到淘汰, 同时其发展的低度性又为某些传统手工业留下了发展空间, 并且还提供了便利条件与资源, 甚至还催生了新的手工行业。济南棉织业、磨坊业等传统手工业的近代历史轨迹表明, 城市传统手工业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并没有遭受毁灭性打击, 而是继续得到发展。这种发展是一种适应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生存与演化之道, 城市手工业依据城市工业化的结构来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结构, 以与城市机器行业产生结构性的互补, 寻找生存空间。不仅如此, 城市传统手工业还注意吸收工业化所提供的优势资源, 来改变自身的相对落后性, 呈现出趋向现代性的一面。并且, 一些手工业企业依靠二元路径实现了向现代机器工业的过渡, 其本质即在于吸收工业化的成果。可以说, 城市传统手工业在工业化的多重刺激下实现了对传统的突破, 适应与创新是其生存之道。这体现了近代城市手工业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 不能用保守与落后概而论之。城市传统手工业的近代变迁反过来对近代工业化的推进产生了积极作用, 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可以说, 在一定的地理与市场空间下, 传统手工业与现代工业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与互补关系, 现代化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手工业所提供的资源, 传统手工业是工业化发生与发展的土壤。而工业化的推进, 一方面为手工业的发展变迁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和领域, 促成了手工业的结构性变动, 另一方面则为手工业的这种发展演变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和可资借鉴的先进管理方法。因此, 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必须充分利用传统资源, 协调好现代化工业与传统手工业的关系, 有条件地走二元工业化路径。

(下转第 120 页)

等价的概念,即都是指本单位在报告期生产出来的结束了生产活动的产品。

在明确了上述基本经济概念的划分依据及其内涵关系后,我们很自然地就能得到它们之间的如下几种对应等价平衡关系:

从产品生产(实物形态)看:总产品 = 中间产品 + 最终产品
从产品使用(价值形态)看:总使用 = 中间使用 + 最终使用
(实物形态的)中间产品 = (价值形态的)中间使用
(实物形态的)最终产品 = (价值形态的)最终使用
(实物形态的)总产品 = (价值形态的)总使用

在这样的对应等价及平衡关系中,理论上说,核算对象无论是一种产品、一家企业、一户居民,还是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成立的。但实际上,在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时,由于核算表现出的特殊性以及产品使用去向观察和数据资料搜集的限制,除了在投入产出分析中应用外,很少针对“个体”经济活动观察这些对应平衡关系,更多地是在“总体”经济活动及宏观层面的分析中考察这些对应平衡关系。

参考文献

[1][8]高敏雪等.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与中国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3]杨灿等.国民经济核算教程[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5][7]董承章.投入产出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4][6]联合国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9]刘起运等.投入产出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 (责任编辑:刘旭挺)

(上接第 48 页)

参考文献

[1]孙宝生.历城县乡土调查录[A].历城县实业局,1928.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济南市志资料(第六辑)[C].1986.
[2]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山东工商报告[R].1931.
[3]龚骏.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4]济南市政府秘书处.济南市市政统计(1934年度)[R].1936.
[5]济南市政府秘书处.济南市各类工业使用动力家数统计表[J].济南市市政月刊,1936,(7、8).
[6][日]冈伊太郎.小西元藏.山东经济事情[N].济南:济南经济报社,1919.
[7]佚名.山东省之织业[J].中外经济周刊,1924(93).
[8]山东国货陈列馆.济南染织工业[M].1935.
[9]济南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济南手工业概况[M].1951.
[10]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总编[R].1934.
[11]济南市政府秘书处.济南市纺织工业调查报告[J].济南市市政月刊,1936(10).
[12]济南市档案馆藏.山东私立厚德贫民工厂章程[B].76—1—534.
[13]華北麦粉製造協會.濟南磨坊業調查報告[M].昭和十九年(1944年).
[14]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M].1934.
[15]叶春耀.济南指南[N].济南:大东日报社,1914.
[16]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7]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8]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世纪济南文史资料文库(经济卷)[M].济南:黄河出版社,2004.
[19]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南开埠与地方经济[M].济南:黄河出版社,2004.
[20]济南市政府秘书处.济南市二十五年十二月份户口变动统计表[J].济南市市政月刊,1937(1).
[21]济南市政府秘书处.济南市漂染工厂调查报告[J].济南市市政月刊,1936(5). (责任编辑:王望)